

中介化哲学丛书

隐性女权的王国

季国清 著

三/60

黑龙江

出版社

中介化哲学丛书

隐性女权的王国

季国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性女权的王国/季国清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3

ISBN 7-207-05888-8

I. 隐… II. 季… III. 哲学—权力—文化—宗教
IV. D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4559 号

责任编辑: 马秀娟

装帧设计: 叶 方

中介化哲学丛书

隐性女权的王国

Yinxingnuquan De Wangguo

季国清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绥化市印刷厂

经 销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0 000

印 数 1 - 2 000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888-8/C·186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阐明哲学是一架机器，它用时间与空间把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时代精神组装成自动加工的系统：它以自然人为原料，以社会人为产品。中国这架哲学机器令人惊奇地疯狂阉割男性，批量化地把生物态的男人变成社会化的女人，而且女性化程度与权利成正比……





季国清，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哈尔滨市人。早年从事语言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现在则主攻哲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前沿问题。出版《中介哲学的逻辑起点》、《汉语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模型》等专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2000 年受德国杜依斯堡公益会嘉奖。

序

——哲学的承诺和对哲学的承诺

我写的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元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虽然我所分析的对象是中国,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道德、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以独立的章节成书的。把这些独立的章节联系在一起的有一种不在场的巨大力量,那就是中国,那就是体现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历史与结构的单子化的中国人。中国与中国人以分形几何的自相似形式表达着严格意义的同构,甚至是严格意义的同一。因此,把中国放上解剖台和把中国人放上解剖台展示给哲学显微镜的是同一副五脏六腑和同一个神经中枢,更是同一副骨骼与肌肉系统。我要回答这样的哲学追问: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这绝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也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考古问题。它是要回答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用它的历史、地理、人种、文化、经济、政治来生产它独特的哲学,回答一个自然人(不仅仅是汉族,而是指任何一个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中的自然人)怎样被一种特殊和特定的成型术变为社会人的。我把哲学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从无到有、从年轻到成年的中介,把哲学理解为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中介。

一切学科皆发端于对研究对象的追问。物理学追问世界怎样由它的最小元素结构起来,以及在结构过程中都由哪些现象发生;生物学自然是要追问生物的发生、发展和进化的规律,生物的表现型特征以及结构信息(即基因结构)与表现型的关系如何。也许这些自然科学的门类从它产生起到今天为止,这些本质的追问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然而,世界上有一个绝对被本质的追问推动和推进的学科,那就是哲学。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发源。巴门尼德用不变者存在给最早的哲学定性。自此之后,西方人开始追问变化之外的恒常性是什么。柏拉图把世界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后,智者和贤人明确了进一步追问的内容,那就是世界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寻找第一动因的合目的性的元初条件,还是奥古斯丁确立的上帝的那个超时间超空间的不变的城堡,都是世界之外的世界的翻版。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对实在、实存、实体的追问。直到笛卡尔发现了变化的此岸世界之中的各种关系更为重要之后,哲学不再寻找世界之外的世界,而是要确认世界之中的世界。哲学的主流形态从本体论变为知识论或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最小元素和元初起点变成了知识的可靠性和知识的获得渠道。哲学开始追问变化之中的恒常性是什么。

康德几乎给这样的追问以一劳永逸的回答,他的批判哲学把现象界的关系产生自然科学、本体界的关系产生伦理学以及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合目的性关系产生美学的机理展示无遗,完成了从实存到关系的历史转变。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胡塞尔发现了我们认识的世界,或者是我们从中获得知识的世界并不是那个呆板的宇宙和自然界,而是我们意识之中的世界,我们之外的万事万物只有进入了我们的意识才能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因此,一切认识皆是反思,皆是直观那个已经不折不扣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中的世界。他则追问人类反思那个在特定时代的恒常性方式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中的世界如何可能。他想让自我纯洁从而不污染那个意识里的美好景象。海德格尔则看透了时间性之中的自我不可能获得一种荡涤灵魂的洗浴,那只能是被历史性和时代性规定的存在,他称之为“此在”。既然此在已事先设定,我们不能追问什么存在,这样追问就掉入了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差式的定义陷阱,无穷上溯的结果只能是循环论证,因此必须追问怎样存在。在胡塞尔的时代,哲学分化的速率让一个哲学流派激活了要追问哲学的背后有没有一种决定哲学价值

的因素,就像商品的背后有一个决定其价值的货币那样。这个哲学流派就是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首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认为表达哲学的语言内在的逻辑关系就像商品背后的货币。尽管这样的追问并没有获得真理的支持,但也带动了哲学的突进。

语言作为一种独立的实在确实是深入了人心,这给后来的哲学以巨大的启迪。风靡于 20 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正是抓住了语言、实在、思想三种本体形态的分野才完全看清了语言在表达思想和实在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种解构的力量。在语言应用的长河中一定会分化出知识的谱系,这同时就是知识的叛逆和造反。这是一个彻底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因此,他们追问哲学一定是形而上学吗?包括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保罗·德曼、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完全证实了形而上学的哲学运动尽管有其漫长的历史,然而却在一种悖论式的两种性质之间煎熬,这两种性质就是超越性与内在性。作为形而上,它一定是超越的;而作为一种理性的世界规则,它又一定是内在的,即内在于我们的变化的世界之中。这和上帝的命运是一样的。上帝作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它必须是超越时空的,在时空之外才能永恒;上帝要以爱君临天下,它又必须内在于我们。超越性与内在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难怪尼采要杀死它。后现代主义举起了尼采杀死上帝使用的宝剑,这回杀死的是理性的形而上学。

没有形而上学还有哲学吗?

没有形而上学不仅有哲学,而且可能会有更好的哲学。得出这一结论决非轻而易举,这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消费。

价值的生产按着被普遍接受的休谟哲学体系的看法,就是在世界的所有事物中划出一条“是”与“应该”的界限,“是”对应着事实,“应该”对应着价值。显而易见,这是哲学必须关注的课

题,甚至是哲学研究的专利。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探讨哲学自身的价值生产。这绝对是一种自我相关的认识路径,却又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重大问题。要是没有 20 世纪哲学范式的巨大转变,也许就永远被人类遗忘了,人类会认为世界上只能缔造一种哲学,就像世界上只能存在一种物理学一样。

造成哲学惟一性的幻象殖民主义文化难逃其咎。毋庸讳言,西方哲学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档案库。西方哲学都是以文本的形式出现的。这同样给人以错觉,似乎只有文本形式的哲学才是哲学。事实绝非如此。西方哲学之所以皆为文本的形式,这是和它生产价值的方式密切相关的。有史记载的西方社会是以超越性的方式生产价值的,也就是把某一个人类主体、某一个学科的文本模式、某一个历史现象提高到同类的其他事物无法企及的地步,并把这个超越者规定为价值的标尺。现在我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制造超越使用的方法都是虚构。西方文明顺顺畅畅地走过了几千年,并没有因为这可怕的虚构导致历史的停滞,其重要原因是西方人同样虚构了一个凌驾在一切超越者之上的最高超越者——上帝。它在世界上没有惟一性的代表,一切价值或总价值由它生成,其他超越者只能分享在自己领域中的殊荣。任何想在哲学中实现超越的人必须留下文本。文本崇拜是超越性价值生产方式的副产品。当它被殖民主义推向世界的时候,也让人迷信起超越性价值生产方式的垄断了。

如果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明智的学问,它是人类的秉赋,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秉赋。如果把人定义为自我创造和自我塑造的动物,那么,人首先是在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国家内先创造一种人的模本,每一个个体的人是按着这种模本来塑造自己的。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创造”和“塑造”。人类的群体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方式创造人的模本,人类的个体以集体的意识和个体的潜意识方式塑造自己。创造使用的材料无非是地

理、历史、种族,尤其是历史的随机的起点,因为历史这样的东西对初始条件十分敏感。我把人类群体创造人的模本的方式称为哲学,其言外之意是每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不论其有没有哲学的文本。当然,这里也蕴含着哲学是多元的、多形态的,它是由民族共同体创造出来的,哲学家撰写的文本有可能和这最本质的哲学相一致,亦有可能完全与其相左。

文化殖民主义在推行文化同一律的过程中也不尽然都是历史的罪恶,它也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正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探针触及了超越性之外的另一种价值生产方式,那就是神圣性。从泰勒开始的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民族的时候,揭示了大量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塑造人的模本。这些原始民族生产价值方式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把人的属性和人所能想像出来的那些巨大而又伟大的力量赋予自然界,再把自然界的相关事物神化,再借这种神化的事物来生产价值。这类似文化人类学所说的那种人认识世界的简单拟人论方式,当然更像奥托笔下的“神圣”。笔者将这种价值生产方式称为神圣性。不过不要以为神圣性一定是比超越性更为原始更为落后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有一个豁达的宗旨和目标,便是论证这只不过是不同于西方人的民族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独特性而已。了解人类学的人都该知道,神圣性是一种本体论,一种不在场的本体论。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更该知道,这才是一种生产“此在”的机制,绝非此在本身。此在就是由这样机制生产出来的,它类似于一些规则,类似于一种生物学中基因编码那样的结构,它决定着人的表现特征,不过这里不是身体的表现型,而是精神的表现型和心理的表现型、知识型的表现型。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精神基因的编码,像生物的DNA的编码决定着黄种人是黄种人、黑种人是黑种人、白种人是白种人那样,在精神上决定着中国人是中国人,印度人是印度人,英国人是英国人。这告诉我们,人就是特定价值的实体化。价值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群体

的选择,人们完全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甚至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不选择。因此,是价值选择了人,或者说是价值俘虏了人。这种塑造人的价值是一种彻底的哲学化,它是规定其他价值的元价值,这就好比黑种人的白肌纤维是由其基因决定的那样。

在神圣性与超越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价值的生产方式?这样开宗明义的追问实在是 20 世纪后半叶才有的事,不过在 20 世纪之初已经有人走到了这一疑惑的边缘。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已经号召我们,在社会自发的行为系统和行为集合之中寻找哲学的蛛丝马迹,确定用群体的倾向体现的行为结构来书写的哲学。20 世纪后半叶社会学风起云涌,吉登斯、布尔迪厄、卢曼、博多里亚等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仅是在揭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就像 19 世纪的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学者做过的那样,他们是在解开社会结构方式和社会运作方式的精神基因的编码。也许这是受生物学的启发,不过他们工作的方向正好和生物学家相反,他们是在社会现行状况之中看到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和运行程序之上由整体性规定的那些规则和规律,这就像游戏的规则是由游戏者与游戏的工具相互作用缔造出来的一样。这难道不是又一种价值的出产方式吗?它不依赖于自然化的神圣物,它不依赖于人格化的超越者。它依赖于历史积蓄起来的影响今天的力量,它依赖于现实的结构对历史的制约和对历史的推进力,它是历史与结构直接性与现实化的产物。我把这样一种价值的生产方式称为凸显性。既然它是生产价值的方式,它就一定能创造出哲学,而且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哲学。这是因为神圣性是一种虚构,它虚构出来的价值一定要披上永恒性的外衣。要是给价值加上时间性,那就被变化这个最可怕的颠覆的力量揭穿其实质;同样,超越性也是一种虚构,它虚构出来的价值要由后继者继续虚构下去,而这种人格化的索链总是不可靠的,历史总要有一天生产出一个叛逆,把以前的东西推翻。从库恩开始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避免

的。凸显性既不怕历史的造反,也不怕结构的桎梏、历史和结构。更确切一点说,时间与空间总会在特定的环境下把价值生产出来。按这种新的方式创造的哲学必然好于以往的哲学。

这种新的价值生产方式会产生新的哲学追问。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哲学追问最为典型。他认为我们应该提出“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作为哲学的目标。它不同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和近代哲学的目标“人是什么”没有什么两样。“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认识论时代的产物。对它进行问句逻辑的分析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绝对不可少的预设条件,那就是知识的丰富和深化最终会给出一个种加属差的回答。随着认识论哲学神话被福柯的谱系学揭穿,人们已经看清了知识的背后不是一个主体性在支撑,而是在权力的股掌之中,真理只是权力的表达式、力量的表达式。知识是政治的,知识所能回答的问题也是政治的。“我们是谁?”这是个政治学的设问。罗蒂如是说。这里包含着对道德同一性的预设和种族中心性的预设,“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复数形式肯定是历史和结构的共时态创造出来的东西,一种凸显性价值的概括与总结。

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的开头就指出了语言的两种功能:表达的功能与指示的功能。作为指代的词语完全依据使用者的意向性来决定其意义与指称。“我们”这样的指代词不言而喻蕴含着使用者的历史和结构。西方人使用“我们”和东方人使用“我们”完全具有不同的政治学色彩,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植根于文化殖民主义氛围之中的“我们”无论是反身自问,还是直叙表达,都有一点沙文主义之嫌。杰姆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研究报告告诫人们,不要在全球推行文化同一律。每一种文化便有一种价值形态,便有一种哲学。为此,我觉得还是把罗蒂的“我们是谁”改为“××人是谁”。这不仅仅因为我最熟悉中国,更因为中国人是最值得追问“他是谁”的。中国人最不知道自己是谁,作为民族国家的最大的谜在中国,作为社会人的最大的谜

还是中国人。

在我深入分析中国与中国人之前,我想解剖一个非常典型的民族国家的哲学,这个民族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哲学,主要是东正教神学,兴起于 19 世纪后半叶,在 20 世纪上半叶臻于顶峰。不过,把它带入顶峰的人物,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等人,基本上都不是在俄罗斯国内完成他们的伟业的。众所周知,20 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是不能容忍“异端邪说”的。俄罗斯 20 世纪的历史随机性的因素肯定许许多多,但也多多少少写在它的哲学里。

别尔嘉耶夫写过一本书《俄罗斯思想》。什么是俄罗斯思想?倒是舍斯托夫的两本书名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一是《雅典与耶路撒冷》,其二是《在约伯的天平上》。两部书的中心论点都是在论述西方文明的两个支柱,即两希文明: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文明的宗教意识。前者以理性的方式生产真理,后者以启示的方式生产真理。而舍斯托夫则不遗余力地说明启示真理比理性真理有更大的魅力。他批驳了斯宾诺沙那句名言——勿哭、勿笑、勿咒诅,只要理解。他则主张亦哭、亦笑、亦诅咒,也要理解。要是把这些精辟的论述联系起来,东正教神学创始人索洛维约夫那句名言,即人是万物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俄罗斯思想的精髓便一目了然了。俄罗斯人对人的理解则是人处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交叉点上。

自从柏拉图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之后,彻底的西方人坚定不移地认定人只是此岸世界的栖居者。奥古斯丁对这一思想的论述也许是最清楚不过的,他论述的方式充满逻辑和理性,只是事先设定了上帝创世的前提。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者一定要和被创造物不同,被创造物是在时空之中,那么创造者就一定在时空之外。我们人类一定在时空

之中生活，因而无法进入彼岸的无时空的世界。自此之后，两个世界的严格划分几乎成了自明的真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联系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中介，这和真正的西方人的看法虽然接近，但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既然人是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中介，那么彼岸世界对人则有更大的吸引力，人既希望自己成神，也希望从神那里获得真理的恩赐。这便是俄罗斯人更喜欢启示真理的原因。

神圣性作为价值的生产方式和超越性作为价值的生产方式与人对世界的理解密切相关。用神圣性生产价值总是要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混淆起来，坚信在此岸世界的追求能实现彼岸世界的目标。用超越性生产价值总是认为人只能在此岸世界把自己虚构成英雄或智者，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推行开来。俄罗斯人恰恰是这两者兼而有之。前者是造神的原始冲动，后者是造英雄的启蒙运动。维柯在《新科学》中把历史分为神仙的阶段和英雄的阶段，显而易见，俄罗斯则把两者融于一个时代。20世纪俄罗斯既造神也造英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揭示了启蒙的英雄崇拜是20世纪德国的希特勒暴政和前苏联暴政的思想根源。其实这并不全面，包括德国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内，都有神圣性这个价值生产方式的孽种。古拉格和奥斯威辛的悲剧要是没有神的旨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上演的。

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肯定对其思想的产生负有重责。从上文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它恰恰充当了东方与西方的缓冲带，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同时给它打上了烙印。俄罗斯人不该穷追不舍地问一问自己是谁吗？遗憾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似乎还没有觉醒到这种程度。

世界上最大的谜在中国。

中国是一个只有历史而无历史性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与

公元后之交上朔到公元前 5 世纪,人类的历史上曾产生五个极权体系,它们的代表人物是阿育王、秦始皇、亚历山大、凯撒与屋大维。这五种极权体系仅秦始皇的极权体系绵延了两千年。这应该是由历史学回答的问题,史学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史学缺乏这样的视角。同时,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使用的知识亦无法由史学来统辖,哲学应该担此重任。

20 世纪的史学博大而又辉煌,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推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如果诺贝尔奖设历史学奖的话,布罗代尔当之无愧。年鉴学派开创了以国家与社会的组织方式考察历史的先河。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得益于社会的组织方式的变革。最早产生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式的组织技术,如契约制、保险业务制、律师制度、市场交换制度等等,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保障。正是在组织上保证了市民社会的存在条件,它才能成为与政治社会、精神社会相抗衡的独立力量。正是人类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技术使资本主义成为了一架高速运转的经济机器,使这种社会制度成为了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直接来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史专家布克哈特的总结千真万确,这一运动的最伟大功绩就是人在发现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人自己。人在反思自己的时候一个千真万确的命名与分类才能成为世界上真正单子化的事物,那就是自我。自我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事物,它没有类,它只有个体。当然,个体的属性必然有相通之处和相同之处,而产生的机理却是永恒的个体化的,绝非用某种模具生产出来的批量的东西。当个体人产生之后,组织一定要就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言。在此基础上,启蒙运动又来推波助澜。启蒙把自然法的天赋人权张扬得尽人皆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入人心。这深刻地反映了两希文明最深层的原则,即希腊理

性精神主张的世界背后的世界的真实性,希伯来宗教精神主张的“像耶稣那样做人”。也可以说,以超越性来生产价值的方式一旦用于一切事物,尤其是用于具有反思功能的人类自己时,它将自发生成一种解构的力量。每一个人都来寻找自己背后的本真性时,必将产生地地道道的个体性原则。换句话说,当西方世界生产出“人”的时候,社会也相继来到了这个并不广袤的地域。市场作为现代社会的合理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手段,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产生,信道的短促又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节奏。整个欧洲在短短的几百年内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天下。

看来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下面几件事关系重大:价值的生产方式,人的生产,社会的组织方式。超越性作为西方世界的价值生产方式,它要寻求一切事物背后的东西;当它寻求人背后的东西时,便产生了大写的人;这个大写的人一旦成为了具体的人追求的目标时,一个个小写的人就这样生产出来了。每一个活灵活现的人要想成为他自己,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社会与国家间的契约。体现社会契约制的市场和体现政治契约制的权力制衡的国家相继产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西方世界的整体性效应是凸显性价值生产方式的产物,虽然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是以超越性作为其价值的生产方式的。

在思索人类问题的漫长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疏漏——人们经常把思索社会的问题和思索人的问题看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两者的关系绝对密不可分。真正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始于19世纪,而且马克思当之无愧是先驱者之一。20世纪后半叶,德里达撰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可以说在其他方面,马克思的幽灵并不怎么活跃,而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影子,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再现了。19世纪和20世

纪之交的韦伯从比较宗教学的路子,研究人与社会时还只是一种下意识的直觉,在 20 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布尔迪厄、卢曼、博多里亚等人则将其开宗明义地当成自己旗帜上金光闪闪的誓言了。这是社会学家的独特目光和笔触。虽不能说是越俎代庖,但是,哲学一定要把它当成己任,因为人的生产方式必须由哲学来提炼。

从表面上看,社会与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组织社会,反过来社会又塑造人。然而,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问题绝非这么简单。要想彻底揭示这其中的奥秘,必须彻底了解从前理解的人到反思的人之间的过程。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布伦塔诺的心理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现象学真正看到了认识论中的人类认识活动都是反思的,也就是说知识的客体不是与我们的认识主体完全对立的客观世界,而是我们意识里的那个世界;而心理主义只是强调心理现象是哲学探索的重要内容。同样是现象学忠实捍卫者的海德格尔与其恩师胡塞尔又发生了新的根本分歧:胡塞尔追问人是如何在意识世界进行反思的,海德格尔则更多地着眼于反思之前的人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显而易见,前者是认识论问题,后者是本体论问题。海德格尔的“此在”其实就是指前理解的人,或者称学会反思前的人。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给此在的描述已经加入了许多社会的成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前理解的人。

关于前理解的人,哲学所能做出的回答不可能十分详尽。心理学,尤其是发生认识论与比较心理学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更大。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告诉我们,前理解的人即出生之后有了心理功能的儿童,肯定是有了一种先验的图式(schema),由遗传决定它的结构。在此基础之上,两种同样由遗传决定的对立统一的心理功能,即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操作把前